

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还需重新考虑

□赵稀方

内地学界对于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情况,一直不甚了了。内地出版的一本“学术研究指南”《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在指导人们研究香港文学的时候,不无眼光地指出:“讲香港文学研究,应包括香港本土对它的研究。”强调香港文学研究应该包括香港本身,虽然是常识,然而是正确的看法。不过接下来,该书又言之凿凿地说:香港文学研究“始于1979年。在此之前,香港本土学人,注意它的甚少,当然谈不上研究”。也就是说,该书认为,香港文学研究是1979从内地开始的。这种看法,在内地是有代表性的。其实香港本地的一些学者对此也未必清楚。1979年创刊的《八方》,第一期就在讨论“香港有没有文学”,这无疑支持了内地学者的上述看法,没有文学,何来研究?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几年前,我在港大孔安道图书馆,偶然发现一大本油印讲义资料,这才了解早在70年代中期港大就对香港文学有过详细的讲授。那是在1975年7-8月暑期,香港大学学生会和文社在港大开设了“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课程轮流讲授,并且编写讲义,剪贴报刊,举行师生座谈。第一讲由黄俊东主讲,题为“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回想”,这一讲由西文和中文的香港背景一直讲到三十年代末的香港文学,报刊方面涉及到《生活日报》《大风》《大公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文艺阵地》《野草》乃至于沦陷时期由叶灵凤编辑的《新东亚》杂志等。第二讲由戴天主讲,题为“五十年代香港文艺的发展情况”,介绍的报刊有《人人文学》《海潮》《文艺新潮》,还提到《文坛》《文学世界》《文艺新地》《蕉风》等。第三讲题为“六十年代文学发展之一”,该讲主要介绍了左翼文学,介绍《文艺伴侣》《海光世纪》《海洋文艺》《文艺世纪》等报刊。第四讲题为“六十年代文学发展之二”,讲者是蔡炎培、许定铭和吴壹仁,介绍了《新思潮》《好望角》《浅水湾》新刊物,以及创建社和文社的活动。第五讲由罗卡主讲“《中国学生周报》的回顾”。第六讲题为“六十年代香港文坛概况的分析”,主讲人是胡菊人,侧重讲了香港与台湾、与欧美及与内地的互动关系。第七讲题为“香港70~75年文坛概况”,由也斯主讲,讨论介绍了《盘古》《七十年代月刊》《海洋文艺》《南北极》等刊物。这次系列讲座的主讲者都是知名作家、学者和编辑,由他们来梳理香港文学脉络无疑具有亲和感。当然,由于各讲分离,在系统性方面显得还不够,在史料上也有参差的地方。此次讲座的最大特点,是从报刊的线索介绍香港各阶段的文学,就对于报刊的掌握程度而言,它们可以说超过了内地迄今为止所有的香港文学史。

三个月以后,1975年10月,也斯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选修部又开设“二十年来香港文学”课程,“该课程评价香港二十年来的作家作品,由50年代的力匡、齐恒、余怀、马朗、刘以鬯、利瓦伊陵、杨际光、萧桐、何达……直至70年代的新作者,目的在整理、发掘及讨论香港本地的文学”。也斯是学者兼作家,对于香港文学有相当研究,相信此次讨论可以弥补港大“学习班”所缺乏的系统性。

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早在1955年,李文就在亚洲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自由文艺》,其中第二章系统论述了50年代的香港作家东方既白、赵滋蕃、易文、张爱玲、沙千梦、徐速、黄思聘、徐訏等人。1961年,罗香林在中国学社出版了《香港与中国文化之交流》一书,其中第六章题目为“中国文学在香港之演进及其影响”。不过,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中国文化,其涉及对象主要都是南来香



港的内地作家。

香港文学的主体,是伴随着香港本土年轻一代的成长而出现的。1959年7月17—18日(365—366期)的《中国学生周报》就连载了两期署名“残樵”的文章《香港是文艺沙漠吗》。60年代中期以后,以吴平接替盛紫娟主持《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为标志,香港本地作家的创作开始繁盛。1971年11月5日,《中国学生周报》第1007期发表《甚么样的文化?》,全文刊载“崇基学院创校二十周年‘香港文化座谈会’”的内容。1972年9月1日,《中国学生周报》举行“香港文学问题讨论”专栏,共计发表了8篇文章,作者包括洪清田、漫健骊、古苍梧、黄俊东和也斯等人。

在港大“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生周报》的回顾”课程后,1976年1月23日,《大拇指》第14期刊出了一个香港文学研究专辑,专辑包括6篇评论香港文学的论文,其中包括:梁国颐的《从〈渔〉看利瓦伊陵的小说技艺》、莫美芳的《寻觅与缅怀——谈新人小说中的三篇小说》、少如的《由绿骑士说起》、伟的《文学、历史》、卢尔德仪的《康同与吴汉魂——试谈王敏敦的一篇小说》、何福仁的《评介三首诗——梁秉钧的〈茶〉》、李国威的《昙花》、康夫的《爱情故事》。评论对象涉及利瓦伊陵、林燕骅、昆南、亦舒、绿骑士、刘以鬯、王敏羲、梁秉钧、李国威和康夫,论述的范围相当广泛。

1978年的素叶出版社和1980年的《素叶文学》,是香港文学的高峰。它既出版了多种香港文学经典作品,如西西的《我城》《哨鹿》《春望》,也斯的《剪纸》、马博良的《焚琴的浪子》、吴煦斌的小说集《牛》、戴天的《渡渡这种鸟》、古苍梧的诗集《铜莲》、钟玲玲的《我的灿烂》、何福仁的诗集《龙的访问》、淮远的散文集《鸚鵡千秋》、康夫的诗集《基督的颂歌》等,也出版了多种文学评论作品,如郑树森的《奥菲尔斯的变奏》《艺文缀语》、董桥的《在马克思的胡须中和胡须外》、何福仁与西西的对话集《时间的话题》等。《素叶文学》除发表作品外,也刊登香港文学评论。值得一提的是,也斯在《素叶文学》第5期上发表了《从缅怀的声音里逐渐响现了现代的声音——试谈马朗早期诗作》一文,文中,也斯经由阅读《文艺新潮》《好望角》等报刊,将马朗、利瓦伊陵、昆南、叶维廉、戴天、李英豪等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与当下沟通起来。从这篇论文的精

已有的中国内地学者所撰写的“香港文学史”,无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学史”,这些“香港文学史”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框架,却没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

“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既有可能互相对抗,也有协成互补的机会。如果简单借用“新文学”观点,就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达清楚。

作为一门学科的香港文学史的建立,首先应该加强对于一手报刊史料的研究。

湛,大致可以推断也斯几年前开设的“二十年来香港文学”课程的水平。《素叶文学》第2期最后刊登了中大文社编的“主要文艺杂志年表初编”,这个年表刊载了自1938—1981年香港文学的期刊名称。尽管这个目录并不完整,特别是1949年前的刊物较少,然而它应该是最早的对于香港文艺杂志的目录整理,也是香港文学史奠定的标志。

中国内地对于香港文学的关注,最早在1979年,在时间上恰恰接续了香港文学的高峰。但出人意料的是,内地学界却错过了“素叶”,而把关注点主要放在了香港左翼作家身上。

在评论方式上,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也是与香港左翼相配合的。1980年内地出版的第一本《香港小说选》,后记中有一段非常简要的评价,“这里收入了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写,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答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这些作品题材新颖、情节生动,另开生面,独具一格,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一段思想和艺术点评,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模式。

卢玮銮认为,由于史料缺乏,香港文学暂时不宜写史,她甚至提出:“由于香港文学这门研究仍十分稚嫩,既无充足的第一手材料,甚至连一个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记都还没有,就急于编写《香港文学史》,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内地第一部《香港文学史》是1990年出版的谢常青的《香港新文学简史》,该书只写到1949年之前,显然就是一部香港左翼文学史。其后又陆续出现了潘亚墩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1990)、潘亚墩汪义生合著的《香港文学概论》(1993)、王剑丛《香港文学史》(1995)、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1998)、袁良骏《香港小说史》(1999)。这些文学史著作,应该说越来越完善,不过来自香港学者的从写作方法和史料角度的批评却至今不断。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是与“九七”回归相配合的,因此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出版在“九七”前后达到高潮。其后随着香港回归,学界对香港文学兴趣逐渐下降,不但著作很少,研究论文也年年下降。

《小说香港》一书面世于2003年,离香港回归已经过去6年,这个时候回顾香港文学史的研究,会更加清醒一些。笔者希望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对历史书写本身进行思考和反省。内地的香港文学史撰写为什么会出现同一种模式?内地与香港对于香港文学史的叙述为何不同?香港本地

人的叙述是否就能代表“历史真相”?英国殖民主义是否也是一种话语讲述?《小说香港》的上半部分为“历史想象”,主要分析香港不同类型历史书写方式,观察香港的文化身份的流动。下半部分“本土经验”,则希望摆脱批判现实主义的模式,思考作为一种新的主体的当代香港文学的发展动力,那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的城市化过程。如果说乡土文学、现代主义是对都市化的抵触,那么新派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学则本身就是商业化的产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都市性及其反省其实是香港文学的命脉所在。

1997年算得上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香港文学研究以内地为代表,而在其后,香港学界开始发力,这其中最具贡献的是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主编的一系列“数据选”、“作品选”和“年表”,其中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1998)、《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98)、《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1999)、《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1945~1949)》(1999)、《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2000)等。卢玮銮等人还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学报刊,促成了“香港文学数据库”,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原文及目录面世。这些基础工作,无疑是研究香港文学史的必要准备。近来引人瞩目的则是陈国球主编的12卷《香港文学大系》,这套“大系”的出现,标志着香港文学经典结构的建立。

《小说香港》完成后,有人劝我不必再研究香港文学了。我对香港文学却不能释怀,觉得现在正是研究香港文学的好时机。

让我高兴的是,香港学者的研究与我的研究出现了遥相呼应。在《小说香港》中,我曾指出:已有的中国内地学者所撰写的“香港文学史”,无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学史”,这些“香港文学史”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框架,却没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在内地,旧文化象征着千年来封建保守势力,而在香港它却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在大陆,白话新文学是针对具有千年传统的强大的旧文学的革命,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文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可惜,这种质疑一直并无反响。最近在《香港文学大系》中,我看到了精彩的说法。陈国球在“大系·总序”中专辟一节,标题是:香港文学大系是“文学大系”而非

“新文学大系”。他解释说:“‘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既有可能互相对抗,也有协成互补的机会……如果简单借用在中国内地也不无疑问的独尊‘新文学’观点,就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达清楚。”负责编辑“大系·旧体文学卷”的学者程中山断言:从1843年至1949年,中国传统文学是“百年香港文学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学史仅仅书写新文学,是荒谬的,“近三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主流研究者,对百年香港旧体文学大多视而不见,或更排斥诋毁,制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学史》,至为可惜”。

在研究方向上,我与卢玮銮、陈国球等人的看法也相近,即不着急撰写香港文学史,而首先应该加强对于一手报刊史料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香港文学史的建立,当然应该从报刊入手,可惜的是,内地学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条件,而香港学者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也不多,重视报刊整理的学者更少。近年以来,我主要从事香港报刊文学史的研究,一旦实际进入一手报刊,我立刻发现文学史种种说法都变得似是而非起来。下面仅以香港早期文学的问题略加举例说明。

在1995年第1期《今天》的“香港文化专辑”上,刘以鬯先生发表了《香港文学的起点》一文,提出香港文学的起点应该追溯到1874年《循环日报》的创建。这一说法的根据,来自于忻平的《王韬评传》中的一段有关王韬在创建《循环日报》时增设副刊的话。我找到忻平的《王韬评传》,发现忻平本人并未见过《循环日报》,他的有关说法,引自于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再查阅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找到所引段落,才发现了问题。

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绪三十年,增加篇幅,分为庄谐二部,附以歌曲曲本,字句加圈点,阅者一目了然。”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绪三十年”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戈公振所说的《循环日报》创立副刊是在1904年。王韬在1884年就离开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这就是说,忻平所谓王韬创办副刊的说法,完全就是一个史料错漏。笔者在大英图书馆查阅数据的时候,曾经专门看过《循环日报》胶片,可以佐证。刘以鬯的这一观点现在被文学史广泛采用,需要纠正过来。

1928年8月创刊的《伴侣》,被认为是“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笔者通过多地查找《伴侣》原刊,才发现伯伦的诸多被文学史沿袭的说法也很有问题。伯伦说,《伴侣》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纯文艺性质的杂志”,“侧重刊登创作小说,其次是翻译小说,此外还有杂文、闲话、山歌、国内文化消息等项目”。事实上,《伴侣》英文名为*Illustrated Family Magazine*,是一个标准家庭生活类刊物,主要刊登生活类杂文,文学很少,直到第7期开始才变成以文学为主要内容,可惜时间不长就没了。《伴侣》也并非由什么文人团体主办,据第1期封底,《伴侣》系由中华广告公司主办,地点在香港大道中六号四楼。

1924年8月面世的《小说星期刊》,一向被我们视为香港的鸳鸯蝴蝶派刊物而加以批判,事实上这是一个综合性刊物,有通俗小说、古典诗文、白话文学、地方剧等多种栏目。仅以白话小说而言,《小说星期刊》刊载的白话小说就有短篇小说60篇,中篇小说4篇,长篇小说两篇。再看,《伴侣》共计发表短篇小说14篇,长篇小说两篇,翻译小说5篇。从数量上看,《小说星期刊》发表的白话小说数倍于《伴侣》,并且,《小说星期刊》还发表了香港最早的“小小说”和新诗。

如此看来,香港早期文学的基本框架,显然还需要我们重新考虑。

■ 动态

“大湾区文学”对话活动举行

6月29日,由《香港文学》杂志社、《作品》杂志社、《特区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大湾区文学”对话活动在深圳举行。来自香港、广州、深圳的作家、刊物主编及学者周雱、陶然、周洁茹、蔡益怀、杨克、王十月、邓一光、张忠亮、于爱成、朱铁军、费新乾、秦岭雪、袁勇麟、凌逾等参加了对话活动。

粤港澳三地唇齿相依,同根同源,同声共振。三地都关联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悠久的海外商贸经验;都具有海洋文化气质,又隶属于岭南文化、人事相牵、血脉相通、文化相连。在国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的背景下,粤港澳三地的文学和文化如何借助大湾区的成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发展,成为与会者关注的话题。

香港虽然地理面积非常小,但香港文学却卧虎藏龙,多元共生的文学形态令香港文学自成一格。蔡益怀用“自由港”“洋紫荆”“石墙树”来概括香港文学汇通中西、顽强发展的特点。他认为,现在香港依然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中心,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码头,在文化交流上有独特的优势和功能。同时,香港作家虽然也以中文进行创作,但从创作意识、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却具有明显的都市化特色,

比如追求“内心探险”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香港现代都市文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化,已呈现出相当可观的实绩。从形式上看,香港文学也能够包容雅俗,为不同创作者提供自如发展的空间。他特别提到,香港文学可贵的一面是许多作家都有在地的情怀,通过文字表现出港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历史经验。这让香港文学呈现出蔚为大观的“我城”书写,展现了一种“居于斯感于斯爱于斯”的家园意识和市井风情。蔡益怀说,这种书写就像扎根在泥土、紧扣着石墙生长的老榕树,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表现了香港文学在商业文化夹缝中坚韧生存的顽强生命力。

于爱成谈到湾区与文学的关系时认为,湾区具有创新发展的生态,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特别是湾区可以提供文学艺术最需要的自由交流的氛围。作家艺术家集聚于湾区,形成氛围、抱团砥砺、沟通交往、扩大发展。简言之,就是建立“湾区哺育文学,文学优化湾区”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他还谈到了深圳的文学发展成就,认为深圳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表现了个性觉醒;最早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劳资关系;最早表现了开放城市青少年的独立观念;最早表现了都市女性在资本和性别政治

中的觉醒;在描写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题材,展示、传输现代观念上,领先全国,最早呈现了现代中国的想象和现代人的精神主体。他强调,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不仅是深圳的,也是全国的,值得重视和研究。同时,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自然会迎来都市文学写作的高潮和主潮,此时的都市文学写作也必然跟过去的城市文学写作发生改变,产生包括对打工文学、移民文学的兼容,对文学的地域性、时代性、城市性、国际影响的兼容,呈现出都市群之间文学主题的某种共性特征。只有这时候,也许才有所谓的“大湾区文学”。

凌逾谈到文学在“大湾区”成长过程中如何拓展时提出,应建构“大湾区文学与文化”概念,打造代表性文艺作品和符号表征。同时,弘扬“海上丝路”文化精神,建构蓝色与黄色文明优势互补的新文化。以海洋文化、岭南文化、粤方言为连接点,在文物保护、传统文化传承等层面联手再造。另外,要重视发挥区域优势和个性特色,就像张爱玲的上海和香港镜像,萧红在香港回望一生写《呼兰河传》等,比如粤港澳作家的个体跨境经验就亟待开发。

(华 雯)



华山云海 刘海粟作